

全球化与中国金融改革¹

王松奇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全球化问题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全局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从小平同志 78 年开始倡导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已经走了 27 年了。现在，我们发现，中国改革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实行的改革路径是渐进式的，和俄罗斯式的、东欧国家的那种休克疗法的改革是不一样的。那种改革，在初期，一般都会引起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上的动荡，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含义就是：不破坏现有政治架构、不破坏现有全社会主要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关系格局。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的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改革和发展。所以，这些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保持连续 2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现在确实影响大，在任何一个市场上，如石油、钢材、铜、电解铝等各种各样的市场上，中国都成了非常重要的喊价力量，任何一个重要的出价都会影响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现在尽管中国的地位在国际上越来越重要了，但是，看看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情况，就会发现：原来的那种渐进式的改革已经累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原来的渐进式改革从策略上说是好的，在改革初期，大家知道，吴敬琏、厉以宁这些渐进式改革思路的主要代表们都说：“狗尾巴不能一刀一刀地割，要一点儿一点儿地割。”因为，这条狗可能太虚弱了，如果一刀割下去，狗可能晕过去或者死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一点儿一点儿割的，现在越割到后面就越痛了，后面的根也越粗了。那么都碰到那些问题了呢？我认为，现在我们碰到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在制度上、文化上、理念上，还有社会的法制架构上，与全球化规则的冲突越来越多。所以我今天就从全球化的角度和大家讲一讲我们的金融改革面临的一些问题。

一、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及其特征

全球化是什么意思呢？全球化就是指在民族国家之间，人、动物和植物、物品、资金、技术、文化、制度这种跨国界的流动和交流过程。最早的全球化应该是以 1492 年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开端。从 1492 年开始，世界的全球化过程就开始了。这个过程大致发展到 1949 年，它可以视为第一阶段，其主要特征是：那些早期兴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缺原料，所以到处去找原料，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就要拿出去卖、拼命去推销、去找市场，如果敲门半天敲不开怎么办呢？那就打！我们中国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曾经有过一次很重要的历史机遇，那就是 1792 年，当时，英国派特使马嘎尼尔找乾隆皇帝谈通商，但是乾隆非常保守，严词拒绝了，当时，中国的封建皇帝最大的特点就是自高自大，认为，我陆地上的东西都吃不完，为什么还要和你在海上通商呢？当时外国带来的一些礼品，主要是座钟什么之类的，乾隆觉得好玩，但是还是瞧不起，拒绝了通常要求。这次很重要的国际贸易机遇丧失之后，它的直接后果就是 48 年之后的鸦片战争，列强用炮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打进来之后强制性地推销鸦片并用低价收购我们的原料，这就是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大致是从 1950 年到 1989 年，其标志是：1950 年，斯大林提出一个假说，叫“两个平行市场”。他认为世界市场是分割的，帝国主义一个市场，社会主义一个市场，他自己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的盟主了。第二阶段的整个全球化过程是以政治上的冷战思维为主导的。在贸易资本流动上，实际上是以主权国家为导向（全球化第一个阶段是以贸易为导向，第二个阶段是以主权国家为导向）。在 1989 年以前的两个平行市场时期，发生了一件重要事

¹本文系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王松奇研究员 2005 年 6 月 16 日在西南财经大学的专题讲座录音整理。

情，即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在 1985 年提出了一个“和平新思维”，其最重要的论断是：“在地球村时代，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这个论断影响极大，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是直接导致冷战时代结束的一个关键人物。戈尔巴乔夫在 1985 年提出“和平新思维”，四年以后，他得到了美国的积极回应，美国和苏联就宣布了冷战结束。现在我们回头看，“两个平行市场”纯粹是胡扯，市场是不可能具有阶级属性的，只要是一个买卖东西的场所就不可能有阶级属性，市场就是制度化的交易平台。

从 1990 年以后，可以看作全球化发展的第三阶段。全球化是以资本、技术信息、知识为导向因素。该阶段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并引起各国的充分注意是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的，现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如果不谈 China，那就肯定会被认为有落伍之嫌。80 年代学日文，50、60 年代学俄文的美国人，现在学中文的特别多，有个笑话：两个女同志去美国，看到一个黑人小伙子就评议道：“这小子长得真黑！”结果这位黑人冲口而出：“你才黑呢！”中文说得很地道。它表明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

二、在全球化的第三阶段，我们所面临的金融改革

我认为，在全球化的第三阶段，我们要面临的改革议题大体有以下几种，第一就是在制度上，第二就是在观念上，第三在政策上，我认为要在这三方面做重要的调整。

首先，谈谈制度上的改革。全球化本来是一种自发的发展趋势，并不强制要求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制度，但是一个主权国家一旦想融入全球化的激流当中，如果你的制度和主流的制度不吻合或者冲突之处过多，就会发现：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别扭之处。比如，现在我们的银行改革遇到的最大问题并不是找出资人、找战略投资者、改善公司治理、转换经营机制、完善财务制度、提高透明度等等，看看工、农、中、建的改革就会发现，最后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定是国有巨型公司同一些国际规则产生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些与政治体制相关的问题。比方说，某一家银行正在搞股份制改造，行长研究了，董事会再研究，最后还要由党委会研究，最后都是由党委决定一切。我们现有的那些要国资控股的大型金融机构，其干部任命制度基本是由党委的组织部门来选派干部，这就与全球化的理念、制度特征、公司治理的趋势等等产生严重的不协调。

另外最重要的还有一些在法律上，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法律法规是最重要的制度，是上层建筑中的核心部分，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上和全球化的趋势冲突特别严重。我们金融业最大的问题，就是法律法规第一不配套、第二跟不上形势、第三有些新修改的法规还带有与全球化规则相背离的特征。比如，今年 1 月份出台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在住房抵押贷款上，自住房只准查封，不准拍卖，银行也不能收回，不能没收，这自然会助长赖帐行为。结果银行的债权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所以，这个司法解释直接导致了全国商业银行的惜贷现象，住房抵押贷款的首付比例马上被提高了，因为有风险了。另外，我们各个行业中的企业，一旦出现破产清算，在清算程序上，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劳动债权优先，金融、货币债权靠后。按照国外的解释，所谓劳动债权主要是指欠发工资，但是一加入中国特色以后就麻烦了，它变成了职工的劳保、退休医疗什么东西都在里头了，等把这些欠帐都还清了以后，银行发现，它已经所剩无几了。另外，在各地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倒闭的一些司法处理过程中，银行系统遇到的普遍问题就是：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宣判、宣判不执行、执行最后你也打不赢。所以，我们整个的法律法规和全球化规则中保护债权人的趋势是背离的。从中国的不良金融债权的形成原因来看，在十多年前，比方说企业普遍造假、提供虚假财务信息，一般是以骗贷为目的，以非法占有银行货币资产为目的，但是最近十多年来，都是为第二个目的——不以非法占有银行信贷为目的，也是堂堂正正想借钱、想发展生产。为了发展生产、为了突破资金可得性的障碍，就得在数字上做手脚，财务造假，最后一旦现金流中断，企业没有达到最终的经营目标，银行的钱也还不了了，形成一

些债务纠纷。在中国，我们一般都不将债务纠纷诉诸于刑法，而用合同法来解决，首先请一个仲裁机构，不行再上法庭，所以债权得不到有效保护。

第二就是在政策上。我认为，现在中国在决策上效率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呢？以金融决策为例，重大决策是由部级协调决定的，大家知道吗，谁是当前中国的金融当局、货币当局？人民银行是吗？周小川是吗？不是！谁也不是。我们的“一行三会”制度，建立了一个相互制约的关系，金融管理实际上分权了，所有的事都是最后由国务院决定。要对一个重大的金融政策建议作迅速判断的话，我认为一般要经过长达至少 20 年以上的长时间的金融训练才行。美国在历史上有几个最伟大的总统，有人评价，里根算是一个，因为他在 80 年代推行减税政策、星球大战计划以及他选择了格林斯潘，他的新经济政策直接导致了美国 90 年代的经济奇迹，连续 10 年的 100 多个月的经济连续增长，经济学家家都开始修改菲利普斯曲线了，因为美国进入了一个叫低通胀、低失业率的高增长时代。里根为什么能在经济政策的选择上做出许多英明的决策呢？原因就在于他有一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有几个人在那里，那几个人是高级专家，你的任何建议，无论是哪一个大学、哪个研究机构的人提出的建议，他一看就知道是从哪本书里出来的。他有这种机制，但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这种机制。我们现在实行的是“部际协调”制度，所以，第一就是中国政策的形成机制有一定的问题；第二就是我们在决策的观念上有些问题。

现在对于中国的金融业来说，排在第一位的问题、最令领导人头疼的问题就是人民币升值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两个月以前，美国民主党人舒谟在向参议院提交的一份议案中说道：“中国必须把人民币汇率提高 15% 到 25%，如果不调整就对所有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 27.5% 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提案出来之后，前不久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又提交了一份东西，也提出了大体相同的一个内容，而且据说还明确地提出，“如果你升值 5% 以下就不算，要升值至少就要升 10%，而且要在 6 个月之内做到。”另外，世界上许多重要经济体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按照 WTO 的宗旨，它是不接纳计划经济国家的，不接纳非市场国家的，因为只要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就会有操纵市场的嫌疑、有对国有企业补贴的嫌疑、有对经济进行过多干预的嫌疑。当年 WTO 把中国接纳了，但是被接纳之后才发现：别人还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是比较棘手的，吴晓灵在一个会上讲了，如果外国政府态度太强硬对问题的解决反而不好；周小川在中国社科院作报告的时候也说，中国的改革有自己的逻辑顺序，我们不会听命于哪个国家；温家宝总理在一个公开场合也表态，说人民币汇率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这就变成一个有政治色彩的问题了。

分析这个问题有几个入手点，我们过去信誓旦旦的说，要维持人民币在供求均衡的条件下的汇率稳定。但是，实际上的稳定是什么稳定呢？看看我们现在的政策实践即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就会发现：我们维持的实际是汇率的名义稳定。从过去几年来看，美元对欧元已经跌了 35% 左右，对日元跌了 25% 左右，最近因为欧盟宪法问题，法国和荷兰投了反对票，欧元稍有点跌，对美元跌了 10.4%，即使这样，仍然没有扭转美元在未来一段时间将持续走软的趋势。大家知道，尽管格林斯潘在不断地升息，美国经济势头也比较强劲，但是美国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双赤字，在 80 年代中期，马丁·菲尔斯坦（哈佛大学教授）提出了一个假说叫 Twin Deficits——孪生赤字假说。最近格林斯潘要退休了，马丁·菲尔斯坦是 5 个候选人之一，有一定的几率当美联储主席，他当年提出这个假说，就是用来说明美元汇率及国际收支方面的规律性问题。现在我们看两个赤字，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你就能判断出美元未来的大体走势。如果这两个赤字不减少，比例不下降，美元的跌势不扭转，那么我们坚持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就有问题了，就说明我们维持的是名义上的稳定而不是实际上的稳定。因为，美元单方面贬值已经在世界货币体系中造成了一种倾斜，中国又是发展中国家中增长最快的大国，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在世界贸易中排第三，GDP 排第四，任何国家已经不能忽视中国。如果人民币继续和美元挂钩，其后果会是什么？我认为是世界

货币比价结构失衡。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从多角度去分析，需要我们探讨的背后的理论问题是，在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是否已经出现了币值的实际低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在当年那次会上的提供的那篇报告中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的：第一，人民币汇率是否被实际低估？大家知道，汇率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在一般分析中，我们用的古典的、经典的方法就是购买力平价和一价定律。一价定律暗含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呢？就是：在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不同地区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在一定时期内一定是趋同的。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我们有两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它们的价格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要素价格的发展趋势是相背离的。第一个就是劳动力要素，我们到沿海地区去调查一下，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那些民工的工资没有什么变化，都在 1000 元以下，和东亚经济体相比是人家的 1/10，和美国比只有 1/40，就是说，劳动力要素价格过低，被人为低估。第二个就是土地要素价格，在中国的区域经济竞争中，各地政府从早期到现在采取的基本都是优惠政策吸引，优惠政策最主要内容是土地的低价批租。全国最有名的例子是昆山，昆山是全国最早以土地零价格吸引外商进来的地方，开了全国的先例。昆山的案例在全国是有示范效应的，全国的地方政府近 20 年基本都是以便宜的土地价格来吸引外资，外商投资超过多少美元，招商局的领导还有奖励，按照引资额的 1%、2%，那也是一笔很大的奖励，所以各地都有积极性，都把土地先整出去，反正地都是国家的。所以，综合来看，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这两个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动趋势和世界一般变动趋势是完全相背离的。这个背离实际上是导致人民币被低估的最直接的原因。

第二，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面。通常来说，一个国家保持了近 3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你的货币币值不动，还紧盯住一个国家不断贬值的货币，这个现象在世界上是不可理解的。当然，认为人民币不该升值，甚至认为人民币还应该贬值的也大有人在，他们担心的是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银行系统造成的债务，他们想到看到的都是这一面。但是，现在把汇率作为一项政策来分析，还要和全球化挂钩，那么必须考虑在全球货币的架构体系中，中国要不要发挥一个经济大国的作用？大家知道，在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在以后的各个场合总是会说，“我们顶住了压力，人民币没有贬值，为世界作出了贡献，得到了广泛的赞誉。”但是，现在全世界，从美国、日本、欧盟到亚洲新兴经济体，都要求人民币升值，为什么我们的政策迟迟不能出台？我们当年的高尚哪去了？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矛盾。

我认为，人民币现在已经不是升值贬值的问题了，实际上，在汇率问题上，我们面临的只是下面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时候和美元脱钩，放弃这种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第二，如果采取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那么这一篮子目标货币如何选择，权重如何；第三，新措施何时出台。现在我们做的一切就是政府和市场在较量，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巨额的外资流入？去年 1 2 月仅一个月我们的外资净流入达到了 3 6 8 亿，一天十多个亿。这样下去，我们再有一、两年就追上日本成为外汇储备第一的国家了。成为第一好不好呢？外汇储备多好像是国力强大的标志，但是，重要的是钱怎么用？在我们的外汇储备中，原来 2 / 3 都是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券，一年期利率只有 1 . 6 % 左右。而我们现在的出口行业的状况是什么？2 / 3 以上的出口企业都是增汇不增收，因为币值太低，到处打价格战，到国外拼命推销，一旦哪个国家告你倾销，又不敢应诉，其实根本赚不了多少钱，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汇率扭曲，导致大量出口各种低端产品。现在美国这些国家都说他们是产业空心化，制造业外移，中国也愿意做这个生产基地，但是我们做起来做去，突然发现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源和原材料问题，我们的资源供给能力现在已经不行了，要维持 8% 左右的 GDP 增长年率，我们好多东西不够用了，钢材年产量相当于美国、英国、日本三国产量的总和，但是还不够，还要大量进口；水泥早就是世界第一了，也还是要大量进口；

铝就进口得更多，铜、铁矿石、纸浆、纸张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需要进口。现在美国一个研究机构已经算出，到 2030 年的时候，那些大宗产品，有的 1/2，有的 1/3 要被中国吃掉，描绘了一种非常可怕的景象。按照现在这样的粗放型的、高投入的、拼消耗的产出模式，我们中国的高速增长在今后的几十年实际上已经不可持续了。

中国现在出现的这个情况就像是全球化第一阶段中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出现过的特征，就是原材料也不够，市场也不够，市场不够就拼命压低价格卖东西，出现过原材料不够就拼命进口。所以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就是尽快实现经济转型，转到依靠技术附加型的，规模集约型的，对所有的传统产业进行强制性的升级，对出口货物进行结构性的调整。然而，所有这些调整都需要金融政策在政策观念上做转变。我们可以作一些看起来不太现实的假定，比如说人民币升值 100%，你想想出口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现有的很多出口企业可能就会死掉，但是仍然要出口产品，因为劳动力、土地这种基本生产要素的价格不会上涨多少，所以还是有相对优势，就要求你要生产高附加值的東西，整个出口产品的结构就会发生很大改变。日本 1985 年广场协定之后，每年的贸易顺差没有低于过 600 亿美元，当年日元对美元升值比我们上述的假定升值厉害，它原来是 360 日元兑 1 美元，后来最高曾经在一天达到 80 日元兑 1 美元，之后就在 90 左右，现在维持在 110 多，也就是说它升值了 2 倍多，将近 3 倍。但是日本一直是世界上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她是怎么做的呢？日本的国策不像我们“抓大放小”，恰恰相反，从来都是“抓小放大”，用 10 年左右的长期合同锁定原材料和零配件成本，消化了货币升值影响。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我认为中国的汇率调整，只调升到一定的幅度，实际上会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一个非常有利的影響。大家知道，中国的山西省是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山西又有一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叫临汾市，那里小煤矿、小炼钢、小炼焦厂遍地开花，为什么这种高能耗、高污染、浪费资源的企业能生存呢？背后还是一个价格体系问题。我们利率比较低，借钱容易，需求旺，生产容易维持，但是如果汇率发生变化，假如我从国外进口一吨钢材明显比你五小企业的钢材要便宜，即使是相同的价格，这些企业也无法生存。所以，价格扭曲直接造成了产业结构失衡，资源配置失衡。

大家知道，我们的中央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房地产的价格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都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了。国家通过给各地政府打电话的方式，而且今年还出了一个新华社社论（这个以前是从来没有的），对有些城市的地方长官进行行政警告，并将之变成考察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标志，看你不能把价格压下去，但是好多地方压价效果仍不是很明显。现在中央一直在强调要把房地产价格压下去，那么，中央是怎么考虑的呢？房地产的价格不压下去，就会造成能源供给、原材料供给、运输供给方方面面的问题。并且，按照凯恩斯的经典理论来考察，这也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储蓄与投资失衡。因为，房地产最终仍然是消费品（在 WTO 里面，建筑业是划分在服务业里面的）。前不久，上海人民银行搞了一个调查，说上海房地产不低于 75% 都是外商投资，外商在中国想赚两笔钱，一是房地产涨价的钱，二是人民币升值的钱，以各种形式进来的外资基本都流入到这个领域去了，所以中央的调整是有深意的。但是，我们的调整主要是通过行政式的、命令式的、乌纱帽威胁式的方式在做。用管制的办法，我们是非常熟练的，但现在来看，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问题，现在，要矫正行为问题，必须用老祖宗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用价值规律，用价格信号，用价格参数，用影响他的经济利益的手段来影响他的经济行为。

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首先要理念上和全球化挂上钩。全球化的理念是什么呢？我认为在 1941 年 8 月 11 日美国、英国、日本联合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上能够找到，就是“保障所有地方的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渡他们的一生”。实际上，这句话，我认为全球化价值观的一个基本原则，它表明的是仁慈、善良、对全人类的关爱。2003 年，德国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投票，选出历史上最伟大的十位德国公民，马克思

被选上了，排第四，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算很厉害的了。它有很多个组，比如艺术组、政治组等，马克思被分到哪个组的呢？他被分到了人类关爱组，为什么呢？大家可以好好看看《资本论》，里面充满了道德批判，比如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样的语句，充满了道德批判和人类关爱，他认为由于两个积累——贫富的积累和财富的积累达到极致以后，矛盾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丧钟就敲响了，社会主义就要代替资本主义了。马克思被分到人类关爱组，说明各种理念只要出自于善，出自于对全体人类福利的关心，最终就能在观念上、意识形态上、价值理念上找到一个耦合点。

对于中国，我认为，我们现在一方面搞改革，一方面坚持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可以和全球化的价值观和而不同，可以保持我们的特色，但是在经济政策上，我们最终的归结点仍然是为中国全体人民谋福利，尽量提高我们的福利水平，顺应全球化趋势，然后再为全世界做贡献。

（责任编辑：程均丽）